

《201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學術座談會紀要

《“一國兩制”研究》編輯部*

主辦：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時間：2016年11月17日(星期四)下午3-5時半
地點：澳門理工學院滙智樓六樓會議室
主持人：冷鐵勛(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主任)

與會者：楊允中(澳門理工學院理事會顧問、教授)

黃璜(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許昌(澳門理工學院一個兩制研究中心教授)

蔣朝陽(澳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邱庭彪(澳門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黃明健(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趙琳琳(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李略(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副教授)

鄺益奮(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

陳志峰(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王禹(澳門理工學院一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

李燕萍(澳門理工學院一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

姬朝遠(澳門理工學院一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

呂開顏(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講師)

謝四德(澳門理工學院一個兩制研究中心講師)

陳華強(澳門法制研究會會長)

記錄整理：陳慧丹、梁淑雯、何曼盈、庄真真、謝四德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在2016年11月15日發表的《201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是特區政府一年一度的重點工作安排，也是澳門居民對特區政府過去或未來一年的施政回顧及展望。近年，澳門社會經濟發展急遽多變，民情訴求更趨多元複雜，如何提升公務員士氣、重整政府部門架構、提高施政能力是公共行政改革的熱點議題；改善住屋、優化交通、消費物價、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備受關注；澳門博彩業自2014年6月開始卻錄得持續26個月的負增長，打破了博彩業一直保持強勁增長勢頭的經濟神話，等等。這些問題是否已得到改善及有何措施去解決？政府如何在早前發表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以下簡稱為“五年規劃”)執行上更進一步推進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完善特區今後的發展藍圖，均是廣大澳門居民非常關心的話題。鑒此，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舉行了《201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學術座談會，邀請澳門高等院校和專業社團的專家學者發表評論，並期望透過討論交流進一步引發社會各界對新形勢下澳門持續發展的理性思考。現將會議紀要整理發表，謹供讀者參考。(有關發言純屬爭鳴之見，不代表本刊立場)

冷鐵勛：感謝各位出席本研究中心召開的《201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學術座談會，以下歡迎各位就施政報告各方面發表高見、互相交流。

報告方向明確，抓住重點難點

楊允中：總的來說，《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是不錯的，甚至可以被認定為近幾年比較好的一份施政報告。報告的方向比較明確、重點比較突出、舉措比較到位，體現了澳門當前的形勢和特點。

《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着重民生工程。相信特區政府是總結了香港和台灣現實的經驗，明白到如果民生工程不到位，居民鬧起來便會沒完沒了，所以把民生議題放在很高的位置。全澳居民平均每年收入超過澳門幣 36,000 元，弱勢群體如老年人、學生等的福利就更多。中產階級和工商業也得到相應的照顧。應該說，澳門特區的民生工程體現了全民福利、全民共享。特區政府公佈用於民生的總開支為澳門幣 123.52 億元，佔政府預算開支約 13%，比例之高十分罕見，從全世界看來，若非絕無僅有也是少有的經濟體能做到。

此外，《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另一個最大熱點是和“十三五”接軌，把“逐步落實規劃，共建美好家園”作為整個施政報告的主題。不過，規劃第一年即 2016 年基本上沒有用上，只剩下 4 年落實，故重點是把剩下 4 年利用好。總的來說澳門與國家“十三五”規劃算是全面接上軌，以此作為《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基調是應該被肯定的。

博彩業收入連續 26 個月下滑，但情況基本上已受控制，或者說，深度調整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雖然博彩業連續 26 個月下滑，但澳門仍然每年都有財政結餘：2015 年是有近澳門幣 193 億元，2016 年前九個月也有將近澳門幣 170 億元。現階段大家預期 2017 年博彩業會全面反彈，但個別月份繼續出現下滑，恐怕也不能說沒有這個可能性。特區政府希望博彩收益每月保持在澳門幣 200 億元，也就是平均每天澳門幣 6.5-6.6 億元，其實不要求這麼多，每天只要平均有澳門幣 6 億元，一年下來就將近澳門幣 2,200 億元，特區政府的博彩稅收就會接近澳門幣 800 億元，不僅足夠行政開支，也確保高比例的社會服務民生開支。因此，本人認為不必要過於緊張，正常的必要開支還是要予以保證，不斷提出“緊縮”，這樣不僅影響澳門的形象，也影響居民的信心。只需要消除一些確實構成浪費公帑的項目，把漏油漏水的環節堵住，澳門業已收縮的財政收入依然足夠有餘。

澳門的經濟指標雖然很高，但現在仍然是“兩缺”：一是缺人才，一是缺資源。首先，澳門缺人才，特別是高端專業人才，《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第 14 頁中寫道：“人才發展委員會將訂定緊缺人才目錄，並開展金融業及建築業未來人才需求調研。”金融業要搞特色金融絕對有必要，需要認真對待。但為甚麼要凸出建築業呢？現在有約 3 萬名建築業工人，當中逾八成不是本地人，既然以外勞為主體，調研目標和意義又何在呢？反之，澳門的博彩業從業員有約 8 萬人，佔全部勞動人口的 1/4，他們之中的莊荷普遍存在低素質、低文化、低專業的問題，這更值得研究和思考提升辦法，因為這將涉及到整個澳門居民的文化素質問題。其次，澳門缺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澳門五個總計 3.6 平方公里的填海區，十幾年前就很明朗化，但至今進展甚微。如果這五塊填海區能早點完成，早點規劃好，很多項目就可以早點啟動，經濟馬上就活了，對博彩業的依賴也可以減低。

澳門作為“一個中心，一個平台”的定位，納入國家發展計劃，絕對是好事。這次李克強總理來澳出席中葡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令中葡合作服務平台這個定位大幅度地提升，對澳門形象有很正面的影響，這是一個最大的支持、最大的禮包，比那 19 項具體舉措都重要。不過，“一個中心，一個平台”都是經濟領域的定位，根據澳門現在進行深度調整的戰略需要，進一步提升澳門的文化定位，即構建有全面國際影響力的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是十分有必要的，澳門有這樣的潛質，也有這樣的發展需求，但這一點迄今未能形成共識，政府到現在仍沒有底氣去講，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美中不足。

施政報告提出要建設“智慧城市”和“健康澳門”。所謂“智慧城市”，既要抓信息化、大數據，也要抓民間智慧開發，澳門本身是具高發展指標的微型城市，開發要力求從澳門現實出發，實現政府與社會同步智慧化。所謂“健康澳門”宜有廣義理解，現代社會除了要有健康的生理素質，還得有健康的心理素質。綜上，澳門應按照自身的發展情況，走好自己的智慧化、健康化之路，這點十分重要與必要。另外，還有關於公民社會建設。公民社會建設涉及到整體居民的綜合素質和競爭力的提升問題，但施政報告中似乎完全沒有提及，澳門發展指標已經很高，是國際水準，但澳門的公民社會、公民意識，包括相關法律的

完善度是遠遠不夠，恐怕至少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由於施政報告注重民生，因為有很多與弱勢群體有關的內容，當中大部分是從社會福利和社會救濟出發。國家“十三五”中，按照國家主席習近平說法，叫“精準扶貧”：五年之後，中國仍存在逾 5,500 萬貧困人口要全部摘掉貧困的帽子。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澳門的弱勢群體呢？過去得到一份資料是弱勢群體佔澳門總人口 18%，就是將近二成居民屬於弱勢群體，就是低於平均收入一半的居民。澳門現在財政充裕，多給一些金錢上的支持是一個積極的舉措，但有沒有比這個更積極的辦法呢？比如工傷的、身體殘缺的，他們的思維能力可能並未受到影響，照樣能夠服務社會，故積極扶貧這種思維澳門應該要建立起來，而且應該有個指標。

另外，施政報告把“五年規劃”作為一個核心的內涵，但是在法律程序上似乎不夠完善。規劃期限是從 2016 年 1 月 1 日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這個時間段跨越第四、第五屆政府，不是現屆政府能夠單獨完成的。而且，“五年規劃”還有一個願景，就是在 2035 年“一個中心”最後建成，這個時間段更是跨越了好幾屆政府。既然這樣，就要講究程序化和公信力。最好是行政長官頒佈批示或命令，把“五年規劃”的全文都在《公報》刊登，使之取得合法地位，或者將其作為施政報告的附件，提交立法會過取得合法性。

關注青少年成長的一個有效途徑是抓好中、小學教育，包括提供優質規範的教材，在澳門沒有編寫自己的歷史教材之前，大陸的歷史教材絕對可以用，不管是誰編寫的教科書，關於香港、澳門這兩個現代史上的重大問題，誰都不能迴避，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不需要擔心。

澳門作為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在維護現有的依法施政、科學決策的前提下，應好好總結 17 年來依法施政的經驗教訓，不僅是總結本屆政府的五年，是整個特區 17 年的發展，澳門“一國兩制”實踐並不是分段的，是一個完整的延續的過程，哪些做得成功的要繼續做好，哪些還有提升的空間努力迎頭趕上。17 年“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國家給我們評價很高，“五十年不變”已經走過了 1/3，如何把後 2/3 的路走好，這是很關鍵的，應該對現狀，或這四屆特區政府延續“一國兩制”實踐的規律有必要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提升。舉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例

子，這是“一國兩制”理論的一個核心課題，但到現在特區政府還有很多人不明白甚麼叫特別行政區制度。資本主義他知道，社會主義他也知道，但甚麼叫特別行政區制度，甚至政府一些官員也不甚了了。所以說宣傳基本法、宣傳“一國兩制”，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中包括對“一國兩制”深層次、系統化推理認知，不能那麼簡單化表面化。比如“一國兩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甚麼關係？一般人理解可以原諒，但作為政府官員卻沒有反應或反應比較遲鈍，這恐怕是非同小可。對於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的理解和宣傳，包括必要的研究，有計劃地投入一些必要的資源，政府亦應保持相應認識，不能說緊縮就一刀切。

落實惠民措施，提高居民福祉

冷鐵勛：特區政府秉持了以往年度施政報告重視民生的傳統，將民生事務作為施政重點。民生問題不解決好，社會就不穩定。社會不穩定，就談不上經濟發展。經濟沒有發展，居民面臨的很多如住房建設、教育投資、醫療保障等實際問題。居民的實際問題解決不好，又容易導致民怨加深，這反過來又不利於社會穩定，進而會形成惡性循環。因此，民生工作事關居民福祉，事關社會穩定，要作為頭等大事來抓。順應這一要求，《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繼續將民生事務放在優先位置，這也是特區政府一直以來堅持“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的一種體現。儘管澳門的博彩業收入目前仍處於深度調整期，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投入並沒有減少，相反不少方面都有所增加。這對於緩解低收入家庭或人員的生活負擔，改善居民生活有積極意義。

《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佈局是圍繞“五年規劃”來安排的。澳門特區第一個“五年規劃”於 2016 年 9 月公佈。《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是“五年規劃”公佈後的第一個年度施政報告。它首次將年度施政安排與澳門特區第一個“五年規劃”進行銜接和協調，有序推進“五年規劃”的落實。《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開門見山地提出“逐步落實規劃，共建美好家園”為施政綱領，整個施政報告充分體現了與“五年規劃”相互銜接、相互協調的要求。

例如，“五年規劃”民生篇中，提出大力推進教育興澳、人才建澳，《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便提出修訂《高等教育制度》法案、推進《私立學校通則》和特殊教育法規的修訂工作等；“五年規劃”提出優化居民福利，關顧弱勢群體，《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提出完善社會保障，落實惠民措施，包括對長者和殘疾人關懷、對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和低收入人士的援助等；“五年規劃”提出實施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提出促進家庭友善，應對人口老齡化等。對“五年規劃”發展篇、善治篇的內容，《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都有相應的體現和落實。

有一點值得關注，在文化建設方面，政府強調保護多元文化，重視土生葡人文化的尊重與保護。《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除提出要完成《澳門歷史城區保護與管理計劃》的編制工作，以及推行“藝術在社區資助計劃”外，特別提到，政府要重視和肯定土生葡人的社會作用，要尊重和保護已形成的土生葡人文化。這對於打造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匯的歷史名城意義重大。對於繼續發揮土生葡人在澳門經濟社會建設中的作用，尤其在加強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中的作用，亦具非常大的現實意義。

總的來看，《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是一份比較務實的報告，是一份逐步落實“五年規劃”的一份報告。由於社會上的利益訴求多元，而社會的資源又相對有限，政府的施政不可能使得人人都滿意，因此，社會上有一些不同的意見甚至批評也是可以理解和正常的。例如，有人提出保障本地居民優先就業，施政報告只着墨博彩業，未提及其他行業；也有人提出惠民措施雖有但對夾心階層的關顧較少，對基層弱勢援助仍有不足；還有人提出政府提交的法案質量有時不高影響了立法效率，希望政府加大立法人才的培訓力度，加快立法統籌機制的建構等。政府要善於認真聽取不同的評價意見，並視實際情況妥善解決存在的問題，對症下藥，不斷完善自己的施政。特別是在“五年規劃”已出台的情況下，政府年度施政的重心應放在落實“五年規劃”上，不用刻意追求新意。只要時刻以澳門的整體利益和居民的切身利益為重，認真檢視眼前不足，踏踏實實做好制度改革、法律完善工作，努力提升行政效率，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就是最大的新意。

許 昌：施政報告和施政方針，年年撰寫擬定，年年程序如儀，年年審議討論，年年如此，如此年年。但要做到年年有新意、有進步，不僅難為了作文章的人，而且也令審議者和評論者都難。

《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內容有沒有新意，大家都發表了意見，我都同意。我覺得，新意肯定是有的，惟更值得注意的是，確有必要對過去每年施政報告的實施情況加以回顧總結，肯定相關的成功部署，檢討尚未完成施政項目的內容並分析其原因。這對於政府施政的延續性和記取經驗教訓很重要，但目前看來做得很不夠，相當一些施政內容延宕很久並無恰當解釋。比如關於《社會工作者專業資格認可及註冊制度》法的修訂，修了 3 年，說了 5 年，到現在還沒有完成的時間表。此番行政法務司宣佈列入立法事務安排的近 30 項事務，有多少項乃歷年都是這麼提，有多少項是長期沒有解決的，有多少項是新提出，這方面分析和解釋得很不夠，這就與缺乏回顧總結有關。故此建議中心以後討論施政報告時，應該重點總結過去一年施政報告的落實情況，否則難免被一些新詞堆砌搞昏頭，就失卻了研究的意義。這是其一。

其二，今年施政報告再度突出強調保障老百姓福利，社會保障優先，這個思路是長期有的，符合澳門的經濟形態和社會生態。因為雖然澳門經濟過去兩年連續 8 個季度下滑，上下壓力形成恐慌。但實際上，博彩收入約澳門幣 2,000 億元，特區政府保持住澳門幣 800 億元的財政收入，目前看是有把握的。澳門特區政府的財政盈餘，不管經濟指標和財政收入怎麼下跌，都始終保持着財政盈餘增長的態勢，並未出現入不敷支情況，澳門仍可以維持全世界社會福利最高的地區。2017 年財政預算安排了澳門幣 123 億元的社會福利支出，永久居民逾 40 萬人，超過 60 萬常居人口，平均人均澳門幣 2-3 萬元的財政支出用於社會福利，這是很高的，但完全符合它的社會生態和經濟形態。

其三，提醒兩個必要的關注：一個是我每次都強調的依法規制博彩業，博彩業是澳門的生存命脈，還有 3 年博彩批給合同就到期了，如何預做研究和準備是當務之急。預則立，不預則廢。澳門政府多年來對博彩博監管口頭上說高度重視，實際的政策表述和執行則非常模糊。故此必須再度呼籲，針對博彩業續約問題，特區政府必須提早預先做全面細緻的研究，這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長期的制度和政策準備，

來不得半點虛與委蛇。二是有關維護國家安全、榮譽和尊嚴的制度保障。大家看到香港少數人炒鬧獨立，相當激動，但不知從何入手加以制止。澳門特區政治生態和群眾條件好，能不能嘗試率先做一些實質性制度建設的工作來把《澳門基本法》第23條的規定完全落地。現在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規定的全部是制裁侵犯國家安全的犯罪的刑法規範，防範、規管和處理相關一般違法行為的行政規範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完善，這顯然迫切需要大家努力研究去修訂和補充現行法律才能實現。

李略：整體來看，我覺得《201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還是挺不錯的，尤其是在目前相對嚴峻的經濟形勢下，惠民措施還繼續加大，有利於社會和諧。從國際層面看，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當選，顯示一個反全球化的浪潮。表面上看，它是反全球化的，但實際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基層民眾經濟改善不足，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收益大部分被上層所奪取；而全球化的成本，比如製造業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藍領工人薪資增加緩慢、工作計劃減少等等卻主要由下層來承擔，貧富差距加大，才引起了這些反彈。

澳門這些年來經濟發展非常快，好在我們基層的改善也非常明顯，從工資收入中位數就可以看出來，回歸的時候不到澳門幣5,000元，現在大概澳門幣18,000元，增幅非常大。對比香港就非常明顯，香港年輕人為甚麼怨氣那麼大，因為大學本科畢業生的入職薪金這十幾年來變化不大，台灣也有類似的情況，所以對社會造成很大的壓力。澳門整體來說經濟發展已經惠及下層。與此同時，《201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仍然注重惠民措施，扶持弱勢群體，興建公屋等等，對社會的和諧還是很有積極作用。

另一方面，在經濟嚴峻的情況下，公職人員的調薪仍有接近2.5%的幅度，估計對公務員的士氣、對整個社會的氛圍都會有利。理論上講公務員的薪金要參照私人市場，但實際上澳門的私人市場相對較小，很多時候私人市場很大程度上又反過來參照公務員薪金走勢的，所以政府帶頭加薪對整個私人市場的薪金上調會有一個正面的促進作用。這次公務員調薪，尤其好的地方就是房屋津貼將會調升10點，這個對基層公務員的幫助比中高層的幅度更大，因為基層公

務員薪酬如果是200點以下的，這個增加的幅度就達到7-8%了，不僅是2.5%了，這是有利於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的。

提升施政效能，加強法治建設

鄺益奮：我認為《201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有關公共行政的內容與以往有些區別，有些新意。第一，在政府架構重整部分中提到研究公共行政架構設置標準，架構重整和設置標準兩者有內在關係。目前第一階段的部門重整工作已基本上完成了，尚餘兩個部門的合併工作在進行中，未能按時完成的原因可能是有一些關於人事、行政文化等方面問題未能得到妥善解決，我認為當初很大可能是因為在決定哪些部門需要合併時缺乏深入的前期研究，沒有預想到可能出現的困難，導致了部門之間在重整過程出現了爭議。因此，訂立科學的標準非常重要，例如何種規模、哪個範疇的部門需要重整，不同層級架構的權限劃分及相關配套機制，等等。第二，行政長官明確地提到了控制公務人員的總量。我認為過去政府提出的“精兵簡政”側重於人員能力的提升，總量控制的目的沒有那麼強烈，今次施政報告的提法是政府對民間有關精兵簡政的批評作出的積極回應，給出了“精兵”的完整詮釋，從重質和重量兩方面體現出政府實施“精兵簡政”的決心。事實上，在“簡政”的過程中，可以與“精兵”一起探討。在部門合併過程中，有一些部門必須面對人手過多情況，這批人員可以經過再培訓，流動到其他需要人手的部門。第三，重視官員問責和績效問題。行政長官向領導官員提出了三點要求：對施政報告的執行是否到位及執行成效如何、自身的工作承諾是否完成、民意是否被接納。我認同今後應該大力推進績效問責的進程，有需要詳細擬定實施計劃，細化問責的具體程序。官員問責制不在於嚴厲的課責，應該重“問”，目的不是“責”。澳門還是比較講人情味的地方，官員不會因為犯了錯誤就一定要下台，問責的目的在於促進政府和居民的溝通，改正已發生或潛在的錯誤，塑造負責任的行政文化。

蔣朝陽：我想就2017年行政法務範疇法務領域有關工作計劃談一些想法。2017年法務領域共列舉了

20項施政重點，僅次於公共行政領域列舉的29項施政重點，比民政領域17項要多3項。仔細分析後，如果加上公共行政領域的法律培訓、法律援助、登記、公證等這幾項，總體而言法務工作仍然是2017年行政法務範疇施政內容的重頭戲。2017年行政法務範疇法務工作有以下幾個特色：第一，進一步落實特區政府統籌立法機制。具體有四個方面措施，其中，提出了2017年法律提案項目在2018-2019年度立法29項，從整個立法規劃來看，都是配合剛剛出台的“五年規劃”中提出的相關立法項目。第二，有條不紊、持續進行整個法律體系的立、改、廢工作。這裏涉及十個方面的法律，既包括涉及到民生的法律，也涉及到五大法典，其中涉及要制定的立法有2個；涉及對原有法律進行檢討修訂的有7個；另外，在完成第一階段法律清理的基礎上，需要對1988-1999年12月19日這段時間的法律進行進一步的清理、適應化處理，工作量無疑是很大的。第三，法務領域中，這些年法律推廣一直備受重視，並在這基礎上繼續保持對憲法、基本法的專項推廣工作，這方面工作持續時間比較長，普及面也相當廣。我個人認為澳門有關憲法、基本法的專項推廣工作比近鄰地區的活動較多一些，更較積極一些。第四，法務領域在國際法事務、國際司法合作以及區際司法方面任務比較多，工作比較大，大概有十幾項工作。第五，重視司法培訓和公務員的法律培訓。第六，配合公共行政服務電子化以及行政程式優化，在法律援助和登記公證方面陸續推出了網上便民系統和相關的電子平台。從上述六方面來看，2017年法務領域的工作量頗大，任務較重，這是由於與“五年規劃”配套實施密切相關所致。

對上述2017年法務範疇的工作規劃有三點建議：第一，目前特區政府已就海域管理使用法進行諮詢，我認為中央授予澳門特區海域管理使用權之後，澳門已經有自己管理的海域，澳門的原有相關本地立法例如《海關法》中傳統上使用的“習慣水域”一詞應相應作出修改。第二，從統籌立法的角度來看，近年來逐步解決了中央統籌立法，但統籌立法是針對法律提案項目，並未針對行政法規項目草擬的統籌工作機制。將來在保證特區法律的統一性和協調性上，可以考慮將行政法規的草擬也納入中央統籌機制中，避免出現行政法規草擬不協調的情況。第三，隨着澳門

融入國家發展規劃和粵港澳合作步伐加快，澳門與內地的關係日益緊密，應當加快與內地的協商，制定國際司法協助的安排協議。2016年6月特區政府撤回了刑事司法協助法案，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個法案協商的時間比較長，難度也比較大等原因，但考慮到目前澳門與內地、尤其是粵澳之間在人員往來、資金流動、經貿等方面的合作越來越多、越來越密切，有關的刑事司法的協助和安排還是應該積極抓緊進行。

陳華強：我想談談關於仲裁的問題。我認為在中葡國家貿易仲裁方面澳門很有優勢，關於這方面我較早之前已向司長提出，但目前特區政府似乎還沒有出台具體舉措的意向，雖然這次的施政報告已有提及，但沒有詳細的闡述具體如何運作。我認為仲裁在澳門尤其是關於中葡貿易方面能夠有所發展：第一，中葡貿易仲裁的重要性在於中國與葡語國家發生貿易的大部分都是國有企業，既然中央政府支持澳門的平台作用，中央也會支持澳門承擔起法律服務平台的角色。但是，葡語系國家何以選擇澳門作為仲裁地，並選擇澳門法律作為準據法？我認為因為葡語系國家大部分法律都是源於葡萄牙，而且大部分地方的官方語言跟澳門一樣都用葡萄牙語。而澳門的所有程序法、實體法都有雙語的。在全球範圍來看，中葡的雙語法律人才最多的還是在澳門，其他地方的雙語法律人才應該還沒有澳門多，我認為中葡貿易仲裁是大有可為的，希望特區政府把握時機，加快推動相關工作。我們應該踏出第一步，開始討論和研究這個中葡貿易仲裁中心的定位到底是一個全新的機構，還是現有部門的其中一個機構。橫琴已經在籌辦國際仲裁院，但橫琴目前的劣勢在於，中葡雙語法律和翻譯的人才不多，但再過幾年澳門的優勢是否還能保持，就很難說了，我認為越拖越久澳門的優勢就越來越少了。第二，關於海域方面，澳門有了自己的海域之後，必須要做好在遊艇自由行方面關於澳門船舶的登記管理。雖然目前正在制定和修改相關的法律，但具體怎麼改，修改到甚麼時候，還是未知之數，希望這些相關配套的法律能與海域的管理辦法一起推出。第三，關於保安部隊的職程制度修改方面，《軍事化人員通則》修訂正在進行徵詢，但我發現了一個問題，保安部隊內部人員在私下聊天時會提出很多意見，但一旦要公開發表時大家就沉默了。這就導致了現在收

集的意見究竟是否客觀的問題。我建議應該為保安部隊內部人員提供匿名提意見的渠道，且對於匿名提出的意見也可以考慮接受。因為保安部隊內部很多人還是擔心公開提意見會有不良後果，因此在公開諮詢時有些問題他們不敢提的情況是確實存在的，例如，他們就不敢公開提及一些他們自認為不公平的現象。所以，希望在修訂這部法律時，能提供多元的渠道讓大家發表意見。

趙琳琳：我想談談對 2018-2019 法律提案項目和立法時間表的想法。

首先，關於區際司法合作和區際司法協助的重要性不用多說，但此次施政報告當似乎沒提到區際刑事司法協作的內容。實際上，區際刑事司法協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上個星期剛好出席了關於打擊兩岸四地金融犯罪的一個會議，在那個會議中瞭解到很多犯罪，尤其是經濟領域的犯罪，跨境化的特點越來越明顯，如果沒有區際刑事司法協助的話，澳門修改《刑法典》是否能達到相應的目的，也是需要進行檢討的。2018-2019 年政府打算修訂有關法人犯罪和信用卡犯罪，包括打擊電腦犯罪等方面的相關法律規定，而電腦犯罪、信用卡犯罪等這些犯罪都是跨境犯罪比較多，如果在區際刑事司法方面不做進一步努力的話，可能會影響相關犯罪的打擊效果，所以我認為不能放棄這項工作，要繼續加強。

第二，關於仲裁和調解問題，在施政完成時間表當中，最後一項提到了仲裁與調解，在預計完成時間這一欄，這一欄寫的是持續進行，但其他欄就有寫到 2017、2018 完成，可想而知這項工作的難度可能不亞於區際司法協助。在兩岸四地或者是“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如果沒有商事仲裁，澳門在貿易服務領域似乎能做的事情並不是很多，如果加強仲裁方面的工作，是能夠在“一帶一路”或兩岸四地的法律服務或商事仲裁、爭議解決方面能發揮一定作用的，但現在由於仲裁的有關實踐沒有很好的展開。另外，關於調解方面，比仲裁的進展比較大一點，政府現時在家事領域已經開始開展了調解計劃，而且還派了一些人去香港進行調解的培訓，這個領域還是大有可為的。在一些區際爭議當中，用調解解決的可能性也是比較大的。從相關仲裁和調解執行的可行性來講要比判決可能更容易一些，特區政府可以在這方面更具體一

點，列出一個具體時間。

第三，特區政府在 2018-2019 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法律提案項目是修改《民事訴訟法典》。從時間表上看，特區政府打算在 2017 年下半年發佈相關諮詢文本。我對這個文本還是有所期待的，事實上當時的法政局很多年前就已提出了要修改《民事訴訟法典》，但是進展一直比較緩慢。從國際或者區際情況來看，民事訴訟領域有兩個非常明顯的變化：第一個是仲裁和調解分流了大部分民事訴訟的案件；第二個是在民事訴訟當中越來越多地引入了電子訴訟的方式。但這兩個變化沒有在澳門民事訴訟法中顯現出來。所以，在這次修改當中，應該向周邊地區多進行學習和借鑒。例如在電子訴訟方面，電子證據、電子數據或者電子資料完全可以簡化法官和律師的很多工作量，可以重點加強研究。

第四，關於修改《司法組織綱要法》的問題雖然沒有被提及，但我認為有必要對這部法律作出修訂。因為《司法組織綱要法》有關管轄的部分有一條規定已嚴重滯後，就是關於終審法院的一審管轄權問題。從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是應該盡快修改的。另外，包括澳門的訴訟效率問題跟《司法組織綱要法》的一些規定也有很大關係，這部法律的修改跟民訴法、刑訴法應該是配套的。

冷鐵勛：我認為特區政府在法制建設方面，能夠配合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優先處理涉及民生事務及基礎性的重要法案。除修訂《高等教育制度》、《私立學校通則》等法律外，還加緊其他涉及民生事務的法律法規的制定或修訂工作。例如，加快完成《防火安全技術規章》、《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等修訂工作，制定《海域管理綱要法》，等等。特別是這次施政報告第一次訂定了未來 3 年的立法提案清單，體現了特區政府重視中長期立法規劃的作用。這些法律提案的內容，包括了修訂《勞動關係法》，跟進《醫療人員專業資格及執業註冊制度》的立法工作、《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法案的立法程序，修訂《輕型出租汽車(的士)客運法律制度》草案，等等。通過不斷完善澳門的法律體系，來加強澳門的法治社會建設，提高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在廉政建設方面，立足當下，又謀劃長遠。《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提出，廉政公署要依法履職，並充分發揮其在維護特

區公共利益和居民利益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廉署要配合 2017 年立法會選舉，開展廉潔選舉的宣傳工作；另一方面，廉署要分階段推出面向公共部門、私營企業和社團學校三個領域的“廉潔共建計劃”，推進廉潔社會的建設，通過開展豐富多彩的廉政教育，增強公務人員和廣大居民的廉潔守法意識。

李燕萍：下面我談談基本法推廣的問題。從香港國民教育事件，以及最近澳門部分人士對歷史教材編寫工作的意見，讓我發現到，基本法推廣領域存在着涇渭分明的兩條綫，一方面特區政府在努力地做，但另一方面一旦落實到了具體狀態時，社會就不買賬了。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原來我們花了很大的努力去推廣憲法、基本法的教育，但是可能到實踐當中，當一個具體事件出現時，就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理想，所以，我提這麼一個建議：在基本法、憲法推廣過程中，是不是考慮改變一下形式，多途徑地強化基本法推廣工作。目前政府是以正面推廣，正面的宣傳教育為主推動相關工作，這很重要，但可否考慮從另外一個角度，比如說，可否從法院的司法判決角度來推廣基本法。事實上，過去 16 年，法院做了很多關於基本法某個條文的解釋。這個想法我是得益於之前王禹副教授轉過來的基本法推廣資料，讓我介紹關於《澳門基本法》第 129 條專業制度，專業制度裏面講到法院判決，法院在關於律師公會的判決，明確的說律師公會執行律師章程，是違反了第 129 條。其實在基本法推廣當中，法院對某一條文的應用，案例可能非常多，我們可以把它整理出來，在基本法推廣當中展示給居民，同時也做到對司法的警醒，老百姓會覺得法院怎麼會這樣判，這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也是一個民眾監督司法的過程。我認為如果能夠做得這麼實的話，可能對憲制性法律推廣更有實際價值。

鞏固經濟成果，力推多元發展

呂開頻：我問了一些青年朋友對《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看法，他們給我的反應就是：比較理性，用一個字形容就是：穩。我再追問下去，那就是沒有新意的意思？他們就一笑帶過。我為甚麼這麼問，因為澳門發佈了“五年規劃”，當中已經有了很

詳盡的安排，但將這些長期的目標切割成短期目標是關鍵，要讓澳門居民、年輕人有獲得感，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這一次李克強總理來澳門參與了中葡論壇，提出了 19 項惠澳政策，這些政策之間怎麼聯繫起來，讓澳門居民能夠感受到是非常重要的。再看《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就是，延續了政府過去的施政理念，注重民生，但是在注重民生之餘，能不能提出真正的政策，讓我們在過去很高的發展水平之餘，再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或者更多的公平機會。這一屆政府已到中期，如果希望政策有延續性，未來的五年規劃也好，對澳門過去的總結也好，必需要提出一些有深遠影響的政策。例如，中葡平台要落地，必須讓年青人覺得自己的未來發展、事業、大學專業能夠跟平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否則提得再多，他們也不會有太大感覺？如果企業只給澳門幣 1 萬元左右的工資，就不一定值得花這麼多時間去葡萄牙學習。如果要做生意、創業的話，去葡萄牙又有甚麼途徑，這些都是很關鍵的。我也同意剛才在座的專家學者的意見，的確是延續了政府過去注重民生的傳統，在這個基礎上四平八穩，亮點是有，但並不是那麼亮眼。這點我也可以理解，因為畢竟有了“五年規劃”，已經有了一個長期的目標，但是把這些長期的目標變成短期可實現的目標，是不是能做到。我本身做經濟研究，產業多元化中要發展特色金融很重要，但是在《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 3 年內的法律規劃中有關金融的法規不多。其實國內很多地方都想把這方面優勢搶過來，如何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把握好這種發展特色金融的機會、推動金融的發展，我們的確是可以兩條腿走路，一邊做實務，一邊草擬法律，但是未來 3 年都沒有相關的詳細立法規劃的話，機會稍縱即逝，中央給了好的政策但落不了地。可能接下來法務範疇會具體再講立法規劃，如果經濟範疇有相關好的政策，如果能夠做得更詳細一點、有更好的規劃，也許能夠幫助實現經濟適度多元。

特色金融這一塊包括融資租賃，經濟財政司的施政報告部分就有提到融資租賃，但是在整體的政府規劃中沒有放到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所以希望既要經濟適度多元，但法律又不配套，各司之間的協調應有待加強。對於未來的發展，我總覺得我們談到很多分享，但社會活力在過去兩年的發展中似乎並沒有很大的展示。中小企業政策，有優惠、有免稅、有扶持，

但是如何真正的提升企業的創新精神，在施政報告裏沒有明確提到。如果澳門既沒有引入更大的投資項目，也沒有開放更多的市場，比如電信政策就都很保守，各領域在一些固有的政策之下沒法完全開放的時候，我很擔心這種沉悶的局面也許就會繼續下去，社會沒有活力。剛才前面也有講到用電子支付問題，現在很方便，可以用微訊、支付寶支付，在八佰伴、大的渡假村裏面已經有電子支付的手段。雖然中小企業能夠實現 WIFI 覆蓋，但是很多中小企業仍然未能做到，如果完善這一點的話，我相信中小企他們自然就有商機，自然就有活力。

謝四德：我對《201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提出幾點看法：第一，欠缺改革的發展意識。無論從歷史發展規律或當今發展態勢看，改革是必然的選擇，李克強總理也強調以改革促發展。但特區政府對改革似乎不太重視，欠缺改革的發展意識。以今年的施政報告為例，行政長官宣讀部分有 17 版，但改革字眼只出現一次，在第 22 版的提升公共行政效能，自崔世安先生上任以來，也從未就改革與發展作為強調或闡述。經濟改革這個詞大家都不會陌生，因為它是每一時代的產物，但《201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經濟財政範疇內容卻沒有出現改革一詞，經濟作為發展的基礎，為甚麼可以不提經濟改革？不提改革如何發展？

第二，沒有指出博彩業恢復正增長的因素。眾所周知，澳門賭收主要由貴賓廳和中場構成，博彩業出現正增長，特區政府有責任指出增長主要是哪一部分拉動？如果由貴賓廳拉動，有可能貴賓廳的問題死灰復燃，特區政府就得小心應對；相反，如果由中場拉動，則這種增長方式符合澳門發展趨向，政府也可以放心一點。這是特區政府該做的卻沒有做，不但沒告訴我們，也不把有關具體數據放在網頁，讓大家知悉。但通過一些報章初步觀察，最近的博彩業增加很大程度是由貴賓廳拉動，我估計原因有可能與人民幣大幅貶值有關。由於國內有資本管制，不排除內地資金有流出的壓力，有一些不法資金通過一些不法渠道選擇澳門貴賓廳流出。無獨有偶，2016年11月4日，行政會討論完《修改第2/2006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及第3/2006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法律草案，同月11日內在立法會獲一般性

通過。兩者是否有關聯暫不得而知，但從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看，它是有存在的可能。原因在於：澳門的賭資主要來於國內，早兩年澳門賭收連續下跌是因為內地肅貪引起，目前內地肅貪行動不變情況下，那貴賓廳的生意何來？從國內目前發展形勢判斷，人民幣貶值導致內地資金流出的可能性較大。之所以選擇澳門，既因為“一國兩制”，也因為博彩業容易洗錢的行業。不過話說回來，這也是一種猜測。為了不讓大家多有猜測，特區政府應該告訴居民近期博彩業正增長是由甚麼拉動，資金來自哪裏？

第三，澳門的產業結構問題不在於博彩與非博彩的產值比重，而在於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之間的產值不協調。根據克拉克、錢納里的產業結構理論，第二產業具有產值優勢，第三產業具有就業優勢，而第二產業的產值主要體現在工業部門生產方面。根據產出法計算，2000年澳門製造業產值為澳門幣 40.49 億元，佔 GDP 比重為 8.08%，2013 年的產值為澳門幣 16.42 億元，佔 GDP 比重為 0.40%，基本上可以說澳門出現製造業空洞化。理論上，因為澳門發生製造業空洞化，所以導致第二、第三產業之間的產值不協調。至於施政報告所提到博彩與非博彩的概念，目前理論上還沒有聚焦於某個行業的表述，而學界也沒有對博彩與非博彩進行學術性的界定，所以找不到有甚麼現實意義。

第四，增加供給量未必降低樓價。有立法會議員指出，特區政府只要增加經濟房屋、私人樓宇的數量，當供大於求時，樓價就會下跌。首先，供求定律有一個非常嚴格的假設，在一個封閉的經濟系統內，且其他因素不變情況下，供求變動才能引致價格的相應變動，我想指出的是，澳門是一個開放型的經濟體，理論上已不符合封閉經濟系統的假設；客觀上，無法確定供大於求的條件，因為澳門是自由港，資金自由進出使我們無法確定外來需求總量，因此也無法做到供給大於需求。如果無法做到供給大於需求，就不能說增加樓宇供給將使樓價下跌。以香港特區政府對外來投資房地產需求管理為例，在不斷增加市場土地供應和興建公屋下，樓價依然上升。這說明，即使採取外需管理，也無法確定供大於求的條件，因為外需管理也不等於封閉管理，不能確定外需總量。

第五，反對特區繼續現金分享計劃。派錢的理據為何？政府知道派錢產生的機會成本有多大嗎？9 年

來總共派了澳門幣 373.65 億元。這筆錢用可以用、必需用、值得用的地方有多少嗎？答案是數之不盡。

李 略：我覺得《201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比較有亮點的是，在經濟發展、促進多元化等方面有很多具體的措施。例如，促進博企與特色中小企的合作，重點推動經濟型酒店、特色主題公園、綜合購物中心設施的建設。對經濟型酒店我有保留，澳門的遊客承载力相對不大，經濟型酒店會不會加大澳門的負擔？高端酒店吸引高消費遊客，可能成本效益會更明顯。我非常支持特色主題公園和綜合購物中心，因為遊客平均留澳時間已經延長了到 1.4 晚，可能會惠及到其他各個行業。如果有一個比較有吸引力的特色主題公園將會有很大的幫助。還有就是綜合購物中心，澳門居民如果到過拱北或者其他地方，就會感覺到差別非常明顯，在大的、綜合的超市裏面基本上甚麼都能買到。而澳門居民一般常去的像新苗、百佳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小的，跟國內一些大的商場、超市比，還是不夠方便。我以前也提到過，內地限購奶粉，為甚麼不在跨境工業區建一個大型的商貿城，大量進口內地居民需要的奶粉等用品，專門為內地遊客開放購買，既促進澳門的經濟發展，又不會影響到澳門的民生，是一個很好的辦法，有利於提高澳門的旅遊休閒中心的知名度、地位。

姬朝遠：《201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發佈之前，特區政府制定“五年規劃”，特區政府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充分結合了兩份文件的內容。縱觀這麼多年的施政報告，我發現民生福祉措施、推進經濟多元化、法治建設、區域合作等內容基本上已成為特區政府施政的重點，相關領域的政策逐漸具體化，並已具備較強的可操作性。但我認為《201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仍略有不足：第一，施政報告的某些發展方向太大，例如加強澳門與長三角的區域合作，卻過少關注珠三角、澳珠深化合作問題。第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如何建成，具體如何實施，可以承載多少旅客，交通設施如何配套，這些問題都有待探討。另外，我還關注對執法機構的改革，如何協調司法警察局和治安警察局的職能高度重疊，如何提升司法警察局在國際司法領域的技術專業水準。

建造智慧城市，改善宜居環境

黃 璜：我想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角度談談對《201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看法。

首先，“五年規劃”主要從民生、發展和善治三個角度來展開論述，而這次的施政報告在這三大篇的基礎上還增加了“幸福家園”一篇，我個人對此還是比較認可的。之前我在《澳門日報》中發表了一篇解讀“五年規劃”的文章，題目是《澳門五年規劃的幾個亮點》，我在最後結論時寫道，“澳門是澳門居民的家園，五年規劃是對家園的規劃”。因此，我尤其感覺到這次報告中把“家園”突顯出來是特別好的一個理念。我想無論是規劃還是施政報告裏面主要體現出了四個方面的核心理念，概括起來就是：一個人、一個家、一個國、一個世界。第一是一個人，我們都知道，澳門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非常注重民生，把民生放在最前面。在規劃裏面，民生篇的篇幅佔到整個“五年規劃”的 46%。可見對民生的注重，突出了以人為本的理念。第二是一個“家”，應該說這個“家”是整個施政報告的一個使命。第三是一個“國”，“國家”這是支撐，故要懂得維護國家尊嚴、國家核心利益。第四是一個“世界”，“世界”是一個舞台，要令澳門“一國兩制”的形象在國際上受到更多認同。我想上述是從宏觀上對施政報告提出的我個人的一個評價。

第二，從中觀層面，我之前對“五年規劃”的社會意見做過一些分析，澳門社會各界對“五年規劃”的期待和意見的統計中，最突出的是教育和人才問題，然後才到基本建設和經濟的多元化，等等，這幾個方面都是非常受關注的。這些內容在施政報告中也有比較好的體現，都深入到了各個章節中。

第三，從微觀方面，以信息化為例，在《201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我看到了幾處，包括：智慧城市部分提到了一些具體的建設也提到了要加強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擴大無線網絡等等。另外，還提到了電子政務，總體感覺政府比較重視，但是政府對當前信息化認識程度還比較有限，國內在信息化方面的發展非常快，不管是在電子政務還是電子商務方面，那麼澳門在這一方面如何融入整個大的時代，如何融

入整個世界的大的發展趨勢，如何結合起來，我想這一方面要有大謀略，大規劃，另一方面也是特區政府在之後的施政過程中要重點考慮的。

總的來說，《201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目標就是要落實“五年規劃”，2017年是落實規劃最重要的一年，因為2016年已經快結束了，那麼2017年工作是否能做好，將直接影響後面2018-2019年的工作部署和規劃。

黃明健：我主要想談一下對環境保護的看法。第一，《201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第三部分“建設幸福美好家園”第五部分專門講了重視保護自然生態，着力完善環保設施。但從施政報告的具體內容來看，這方面的內容非常籠統。環境保護在施政報告的主要工作時間表當中列了11點，也做了具體安排，在運輸公務範疇也列了8點，可以看到政府在這方面還是做了工作，但我認為對整個環保規劃和安排還是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沒有對環境進行監測、調查。事實上澳門環保存在的一些問題還沒有具體化。例如二噁英的問題，香港浸會大學有一位教授來澳門做過了關於垃圾的監測，主要是關於澳門垃圾焚燒帶來的二噁英污染比較嚴重，特別是在氹仔可以監測到。而由二噁英引起的空氣污染、海水污染目前也沒有相關的監測。另外，關於垃圾分類上，澳門比較重視塑料的分類，但在垃圾分類上面做得不具體不到位。其實垃圾分類是很重要的，台灣做得很好，台灣花了超過30年的時間調研。我感覺在環境保護具體措施上，落實細化上還是不夠的，仍然是較為統籌式的。

第二，環境問題要解決好並不是環保局一個部門能解決的，其實跟衛生部門也是息息相關的，是否可以綜合化統籌安排？正如剛剛提到的二噁英問題，環保局應該與衛生局進行聯合調查，如果沒有監測、沒有調查，很多情況就不明確了。我從與澳門居民的交往當中，發現現在很多年輕夫妻不育症很嚴重，不育症很多時候是二噁英引起的。另外癌症發病率的分佈情況調查可跟具體的衛生環保統籌起來一起做，這樣更具體一些。

第三，環境問題首先要考慮環保教育，不足的地方再尋求制度方面的救濟，制度不足的話，再尋找技術方面的救濟，因為環境保護與科技技術的關係非常密切，並不是單打獨鬥就能解決問題，這在澳門的施

政報告中沒有提到。總括而言，施政報告中關於環境保護的部分太籠統了，報告雖然列了施政的具體工作時間表，沒有想過調查部署也把握不住具體要做什麼。政府十分關注民生，但其實癌症、不育症等也是民生問題，希望政府能綜合考慮，一起解決。

李略：從施政報告來看，這次政府真的是要推動都市更新了。都市更新在這十幾年來進展不大，同意重建或更新的業權比例是一個難點，到底百分之多少的業權人同意可以推動，這個可能不能定得太高，但太低又可能損害到一部分人的業權利益。可能根據樓齡和安全性來區分同意的業權比例會比較合適：越老的樓、安全性有問題的樓，其重建或更新所需要同意的業權比例越低。還有中轉房，如果可以以暫住房的形式供受都市更新影響的人居住，相信對進一步推動都市更新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隨着澳門的越來越多的樓宇接近50年甚至更老，都市更新的壓力和緊迫性會越來越大，政府需要更大力度地推進。與此同時，政府是不是還應該推動在各個樓宇安裝監測裝置，尤其是一些較老的樓宇，隨時監控其安全性，科技的進步應該可以較低成本較容易地做到，避免可能發生的公共安全事故。

在交通問題方面，我覺得可以加強或者是應該更大力度推進的是一種類似優步網約車的服務，不過政府基本上認為這種服務不具合法性，可能是擔心影響現有的的士業界，在新的政府報告裏面也沒有提。這是一個新的共享經濟的方向，從其他地方經驗來看，他們之所以能夠持續不斷地創新，政府的支持是很有幫助的。澳門的創新比較少，市場小，人才也不多，不管是技術創新還是各種創新，都會比較少，這時政府就要扮演更重要的作用，比一般大市場政府作用更加重要。例如，新加坡政府主動邀請谷歌在新加坡試驗自動駕駛車輛，澳門政府也應該走出去，看有甚麼還在試驗階段的高新科技，可以提供一些資助，讓他們在澳門進行實驗、創新。類似網約車這種又能解決市民出行難，又受到廣大市民支持的，沒有理由有於法律的限制而禁止它。

另外，2016年政府也提過電動車的推進，但這一年只是在公共停車場多建了充電裝置，實際上更重要

的是怎麼從政策上甚至提供補貼來推動私人停車場的配置充電裝置。除了電動汽車以外，應該將重點放在電動電單車上，我曾經看到過一個資料，不知道準確不準確，一輛電單車的污染是一輛汽車的 4-5 倍，雖然其耗油量相對低，由於汽油燃燒不充分，污染物排放可能比汽車還要高，走在電單車旁邊時的氣味比走在汽車旁邊還要難受。澳門有十幾萬輛電單車，如果全部換成電動電單車的話，空氣質量將大幅提升。

我在課堂上對學生作過調查，願不願意將原本的電單車換成電動電單車？所有人都贊成，但不知道去哪兒買，不知道如何實行。內地、台灣目前都有一些非常有優勢的電動車品牌，時速可達 50-80 公里，續航達到 100 公里，非常適合在澳門使用。我覺得政府應該更敏銳、更積極地去應對這些新技術、新趨勢，才能夠使經濟持續發展。

內地現在有一間新的網絡公司叫 OFO 特別熱門，它是一個自行車分租的公司，費用非常便宜，大學生約五毛錢可使用 1 個小時，普通市民是 1 元錢 1 個小時。目前在澳門講單車當然不現實，但政府應該主動地去研究和思考，引入並推進電單車分時租賃的服務。根據歐美的經驗，一輛分時租賃的汽車可以取代 9-13 輛私家車，因為私家車大多數時間都在停泊，使用的時間一天不到 1 個小時。如果採用分時租賃的方式，既可方便出行，也可適當緩解澳門路少車多的擁擠狀況，降低居民出行成本，提升居民的生活素質。

邱庭彪：我想分享兩點看法：第一，有關交通問題。交通事務局一直在努力改善交通狀況，但由於一些固有習慣，改善成效不彰，最主要原因是堅守不住最重要的原則。我們常常提公交優先，巴士服務的確已經大幅提升，但在澳門道路利用的有效程度方面還是不足的，而這主要是管理問題。交通運輸範疇制定了不少政策，但執法力度不足，這是由於交通事務局對路面的車輛，除了的士之外沒有執法權，全靠警察執法，這麼多年來沒有通過修法賦予交通事務局執法權限，導致執法出現了缺口。另外，我已經多次提及道路使用的問題，例如，行人天橋已建好了，但卻在天橋下面設斑馬綫，天橋便如同虛設，行經斑馬綫的路人使路面的行車速度減慢了，行人過路設施的政策

出現矛盾，使路面的效益就明顯降低了。另外一個問題是道路工作，經過暑假之後，大家本以為道路開挖工程都已完成，但原來不是，正如我剛才從橫琴過來，經過一處是先挖右邊，再挖左邊，使路面的使用效率變得很低，講這個例子是為了說明目前施政上的問題主要是管理問題。在工務範疇、整個政府施政範疇，都需要使有限的資源發揮最高的效益。資源不會無窮無盡，可能政府現在很多錢，但錢如何運用，用在有效的、體現到效益的地方才最重要。我們現在看不到很好的效益，居民以前認為房屋問題為首要問題，現在交通問題成為了首要問題。

第二，有關的士問題。近期經濟差了，很多人都發覺打的士容易了，但始終仍然不方便。在北京、上海、香港、台灣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很方便，如果乘客想要使用好一點的交通工具，先不論價錢，起碼從方便程度來講，的士比澳門優越得多。如何落實一百部“黃的”很關鍵，過去“黃的”一直存在，取消了其資格再引入一間新公司，好還是不好？至少我並不看好。在法務工作方面，電子訴訟，或者在訴訟中利用電子科技來進行，很多地方都已普及。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的電子科技非常先進，相比起來，澳門好像落後了 20 年。澳門現行的訴訟手續，在處理文書、證據、開庭各方面完全配合不了澳門的社會發展。當然，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我認為司法機關是為居民服務的，要重視如何去提高居民的認受性。訴訟文書的電子化、訴訟證據的電子化，可以省卻很多的麻煩。其中，司法大樓能否建成是一個關鍵問題，但司法大樓未建成，在商業樓宇中做電子科技也不是一個障礙。

完善專業制度，加強人才培養

陳志峰：本人是研究澳門教育的，《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當中其實有兩個重要的法律要給提出來，2017 年可能要進行立法或繼續工作，其實這兩個法律對高等教育或非高等教育來說非常重要。第一個是講了很多年的《高等教育制度》，《高等教育制度》應該是回歸之後澳門檢討教育制度時，把《高等教育制度》、《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放在同一時間在檢討，但《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在 2006 年 12 月就通過了，而《高等教育制度》一拖就拖了 10 年，實

在地說,《高等教育制度》諮詢文本已獲得了社會很多人的認同,但是作為教育領域中一個關鍵的法律,特區政府仍然是繼續跟進而已,法律遲遲未能制定出來。據瞭解,目前《高等教育制度》(草案)已送到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作討論,並把意見送回高教辦,由高教辦根據意見重改一次,送到行政會,完成程序後,之後再送回第二常設委員會再討論一次,現在到了約見政府代表聽取意見的階段,這說明《高等教育制度》的立法正在密鑼緊鼓進行當中。看看時間表,如果2016年之內要完成恐怕不容易,時間非常緊張,最快估計是2017年1月才可以完成。說白了,如果法案再被拖延,很可能在這屆立法會成為流案。希望大家在這方面要多關注,這對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是一個很大幫助。將來《高等教育制度》通過後,還有很多相關的法律法規要跟進,例如,可能牽涉到一些公立學校需要改變或修改其人事章程,按照現行法律規定,也要經過立法會通過,畢竟關於人員薪酬福利的內容,當中有可能會遇到一個很大的爭議。

另外,我覺得非常敏感或非常有爭議性的是《私立學校通則》的工作。因為2017年是立法會選舉年,我們看到社會的爭議也在教育體系當中,之所認為《私立學校通則》較敏感,是因為它是有關於澳門私立學校的一個管理問題。過去幾年,很多私立學校運用公共財政不符合規則的情況被曝光,不排除他們當中有犯罪的行為,但是這些事情被曝光後,社會會認為私立學校的財務跟學校管理是有點混亂,人家也是抓住了把柄一直攻擊那些私立學校,所以,2017年立法會選舉期間,《私立學校通則》放到立法會討論時,本來是一個制度建設的工作,最後可能變成一個政治敏感的議題,因此要做好這些問題的準備工作,否則,將會沉重打擊整個教育系統。記得之前《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是在私立學校教學人員放假時制定的,那時候是非常政治性,2012發生教師遊行,也是因為《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引起的。雖然《私立學校通則》未必會引起《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那時的震撼,但是在一個泛政治化的環境之下,政策的諮詢工作與法律立法工作一定要做得更穩妥,就像教青局與人大出版社編的歷史教材事件,已經在網絡上被批

評得像香港國民教育一樣。類似這種事情,人家就會不斷挑一些毛病,在這個範疇當中怎麼做好相關工作的準備與講解,這些事情恐怕是特區政府要考慮,否則很多正面的事情變成政治化,這是不利的。

趙琳琳:關於《社會工作者專業認可及註冊制度》,我記得在較早之前曾經出了一個諮詢文本,但當時並沒有獲得通過。我認為這個法律非常重要,因為社工制度在港澳台地區都是比較發達的,相對中國大陸和港台地區而言,澳門的社工制度相對比較滯後,例如說在專業資格認定上面並沒有一個統一規定,這也給管理和使用社工上面帶來一定的困難。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的機構,社工的作用越來越大了。《201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將其列入計劃項目當中,希望能盡快推出法案文本。

邱庭彪:在高等教育方面,希望《高等教育制度》盡快通過,讓我們高教工作中的一些制度可以得到實施,尤其是可以讓學生同時修兩個學位,一是將澳門的高教資源充分運用,二是對人才、人力資源的豐富很重要,因為學生跨專業學習之後,更接近社會的操作,將來工作時實際操作容易些。在《高等教育制度》不知能否通過生效的期間,做了很多準備,一年復一年,很多東西銜接不了。

李燕萍:我個人非常關注《粵澳合作框架協議》,這個協議已經簽了好幾年了,其中,協議第五章第1條第1點寫到,“澳門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向澳門大學等高等院校就讀的廣東學生提供獎學金”。這一條有沒有落實?由哪個部門去落實?我曾分別詢問過澳門基金會、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教育暨青年局等部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告訴我,它只負責研究生的獎學金,本科生的獎學金在教育暨青年局,我甚至打給了澳門大學學生事務處,因為它負責學生具體獎學金分配工作,最後得知沒有這項獎學金。到目前為止,《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明確承諾給廣東學生在澳門讀書提供獎學金,但事實上一直沒有落實,這是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需要得到關注。